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8 月 22-23 日)

1、CFR：避免重塑人工智能治理之本

8 月 20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其网站刊登来自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杰克·科里根（Jack Corrigan）和研究员欧文·J·丹尼尔斯（Owen J. Daniels）的文章。文章围绕美国政府机构如何快速扩大针对人工智能（AI）的治理工作展开。考虑到 AI 技术迅速演进及其在经济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美国政府应将治理工作融入现有机构职责，而非从零开始创设治理模型。许多监管机构已具备覆盖 AI 系统的法定权限，如美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在飞机安全标准方面的权力。此外，现有监管结构不仅合法可行，还能有效利用内部专家知识。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额外培训有效监管 AI，但这比教育 AI 专家掌握所有潜在应用领域的细节要容易。尽管利用现有权限管理 AI 将面临挑战，如需改进软件保证程序和测试标准等，但这种方法不需新法规，也避免了创建全新监管流程的资源消耗和法律挑战。因此，文章建议美国联邦机构应评估其监管工具，并确定如何将现有权力应用于 AI，以制定 AI 系统的监管框架并寻求填补权力空白。

<https://www.cfr.org/blog/dont-reinvent-wheel-govern-ai>

编译：陆逸沛

2、《外交事务》：美国尚未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战争做好准备

8月5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马克·米利（Mark A. Milley）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文章《美国尚未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战争做好准备》。文章强调，美国应积极改革以适应人工智能（AI）时代的新战争形态。新技术正改变战争形态，尽管战争“寻求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将其政治意愿强加于另一方”这一性质不会改变，但是战争的特征将会改变。军队的表现往往取决于他们对技术创新的适应和应用程度。在AI的赋能下，未来战争不再是作战部队数量和武器的问题，而是自主武器系统和算法问题。无人机可能主导未来战争，提升作战效率，减少平民与士兵伤亡，并降低战争成本。然而，美国对此并未准备好，俄罗斯和中国却在无人机军事化应用上领先于美国。文章建议，美国应迅速采取措施以适应AI时代的战争新形式。具体来说，美国应改革军队结构，优化采购新型装备流程，训练士兵更好使用新技术。同时，美国还应确保军用AI受到严格控制，让其处于人类指挥下，并能够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美有不同的全球愿景，但是

中美在管控 AI 的安全使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i-america-ready-wars-future-ukraine-israel-mark-milley-eric-schmidt>

编译：赵英慧

3、《福布斯》：人工智能对治理、风险和合规领域的影响

8月21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官网刊登其理事会首席信息安全官马特·希拉里（Matt Hillary）的文章《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治理、风险和合规领域》。文章认为，虽然人工智能（AI）在治理、风险和合规领域能带来许多积极因素，但依然存在多种风险。一是数据隐私和安全性。训练 AI 模型所需的大量数据可能包含敏感数据，这使得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集和模型本身都成为网络攻击和其他特定于 AI 漏洞利用的目标。必须实施防护措施来保护其 AI 资产，确保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隐私和安全性，并确保持续遵守最近出台的有关使用法规。二是如偏见、歧视以及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道德问题。在训练 AI 模型时，如果训练数据有偏差，算法将使偏差永久化。AI 决策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使问题更复杂，并可能产生有害影响，尤其在风险评分和尽职调查等敏感领域。为解决这个问题，组织必须制定强大的 AI 政策，确保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集公平性，并确保 AI 决策过程容易被跟踪、理解、验证和纠正。三是存在过度依赖 AI 的风险，使组织面临因技术故障而导致的漏洞和法律责任。

因此必须将 AI 视为一种增强机制，而不是人类判断的替代品，以确认所生成输出的准确性。此外，还必须解决在使用 AI 时的技能差距，这需要在培训、雇用和管理潜在的劳动力流失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许多安全计划将 AI 评估作为其外部渗透测试活动的一部分，以检查组织在其产品中使用 AI，并鼓励其应用程序安全团队成员增加他们对 AI 相关安全漏洞和弱点的专业知识。

<https://www.forbes.com/councils/forbestechcouncil/2024/08/21/how-ai-will-impact-governance-risk-and-compliance-programs/>

编译：曾星月

4、CSIS：应评估开源大模型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8月1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研究员马索·达尔格伦（Masao Dahlgren）评论文章《开源人工智能辩论中的国防优先事项》。文章认为，近期开源大模型的迅速发展引发关于人工智能滥用与风险的担忧，但开源大模型独有的灵活性与可靠性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军事应用前景。首先，开源大模型能减轻国防装备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出于性能考虑，美军当前普遍采用少数几个厂商开发的闭源大模型。这使得美军在价格谈判时常处于劣势地位，订单向少数厂商的集中也导致了供应链风险与产能压力。而随着开源大模型的发展，其价格也被不断压低，有助于美军控制成本并增强国防供应链韧性。其次，开源大模型更加安

全与可靠。开源大模型允许美军自行根据其保密与可靠性要求对源代码进行修改，提高了大模型部署过程的便捷性和性价比。开源大模型也往往拥有更加活跃的用户社群，进而可以迅速识别、修改大模型的漏洞与问题，提高其可靠性与可解释性。最后，开源大模型有更广泛的应用案例。相较闭源大模型，开源大模型在商业与社会用途中有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与案例。而上述用途所涉及的定制思路与代码，可以作为军事场景下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基础。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ense-priorities-open-source-ai-debate>

编译：高隆绪

5、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日本 AI 国防政策

8月16日，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网站刊登战略研究计划研究助理阿比舍克·夏尔马（Abhishek Sharma）的文章《日本 AI 国防政策》，文章认为，日本最新公布首项国防 AI 政策旨在强化军事力量，与 2022 年国家的安全战略保持一致。日本自 2022 年起将 AI 融入军事体系，以强化国防。目前，AI 项目进展顺利，预计 2024 财年预算将增至 2000 亿日元，占总预算的 1%。此外，日本计划成立技术研究中心，专注于无人飞行器和水下作战系统，并与美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盟友合作，推进 AI 在国防领域的应用。在国际层面，日本基于人本主义、风险管理和多方参与原则，建立了新的

伙伴关系。这些原则与西方国家对 AI 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应用的关切相一致，日本在国际 AI 平台上积极推动负责任的军事 AI 使用，维护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日本将 AI 纳入军事领域，标志着其向“积极和平主义”转变。国防 AI 的成功实施依赖于快速将民用技术转化为军事用途的能力，以及军事和文官机构在确保 AI 的道德和负责任使用的同时，应对监管和安全挑战的能力。尽管工业界对军事 AI 合作持谨慎态度，但日本与盟友的合作进展显示出积极势头。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japan-s-ai-defence-policy-navigating-cultural-and-bureaucratic-impediments>

编译：刘嘉滨

6、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人工智能在战场上的作用

8月20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刊登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访问学者彼得·莱顿（Peter Layton）的文章《战争中的人工智能》。文章认为，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凸显了人工智能（AI）在军事应用的作用。以色列军队使用“薰衣草”AI 赋能系统来收集数据，从而辅助军事人员打击目标的过程。

“薰衣草”系统的运用展示了 AI 如何简化操作流程，从而提高攻击效率，但同时也暴露了军事人员过度依赖 AI 的风险。在未来由 AI 驱动战争中，有效的人机交互变得至关重要。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和乌克兰逐渐挖掘 AI 技术潜力，将 AI 整合到半自主的空中、陆地和海上系统，使这

些系统不仅更难以受到电子战的干扰，还能自主攻击目标。文章建议，如何在 AI 驱动的战斗中占据优势，可以参考乌克兰将 AI 赋能系统与常规武器相结合的策略。AI 赋能武器系统的发展和普及可能会使防御在攻防平衡中占据更有利位置，但这并不能保证不会有国家利用 AI 赋能武器系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rtificial-intelligence-at-war/>

编译：陈芳芳

7、《国家利益》：哈萨克斯坦在中美竞争当中的作用

8月20日，新航线研究所高级主任尤金·乔索夫斯基（Eugene Chausovsky）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文章：《哈萨克斯坦在中美竞争当中的作用》。文章讨论了关键矿产的重要性以及哈萨克斯坦在其中及中美之间的作用。首先，关键矿产如锂、铜和稀土元素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生活的重要资源，中美两国都试图确保获得这些资源。其次，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因此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之一。但哈萨克斯坦采取的是一种“大国平衡”策略，既不偏向西方集团，也愿与之开展合作，这使得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寻求多样化的关键矿产来源，以应对可能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在此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倾向和经济实力使其成为中等强国，有能力在全球主要国家间保持平衡关系。其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使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占

重要地位。总的来说，哈萨克斯坦在中美竞争中扮演关键角色，其外交政策平衡性使其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自身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然而，如何处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及如何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等问题，也是哈萨克斯坦需要认真考虑的挑战。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哪个国家能更好掌握哈国外交政策平衡的微妙变化，哪个国家就能获得关键资源、跨洲贸易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战略利益。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ilk-road-rivalries/kazakhstan's-role-us-china-competition-212392](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ilk-road-rivalries/kazakhstan-s-role-us-china-competition-212392)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

8、《政客》网站：影响美国大选的五大全球趋势

8月20日，美国《政客》网站发布其特约编辑马修·卡明斯基（Matthew Kaminski）的文章《将影响美国大选的五大全球趋势》。作者认为，尽管国内趋势是重要的，但美国政治并不是处于真空状态。8年前英国公投脱欧的惊人结果预示一场破坏性的政治事件，对移民和全球化的愤怒以及反叛的民粹主义竞选吸引力，使特朗普最终入主白宫。从外部而言，有五大趋势将影响大选结果，其中两个对哈里斯有利，两个对特朗普有利，一个则是未知数。第一，女性政治家的崛起。从今年6月成为墨西哥总统的女性克劳迪娅·希恩鲍姆（Claudia Sheinbaum）到欲参选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首位女

首相外相上川洋子（Kamikawa Yoko），再到刚赢得欧盟委员会主席第二个任期的冯德莱恩，尽管存在偶然性，但这一趋势有利于哈里斯。第二，中东前线的冲突。近期中东发生的超出美国控制范围的事件不利于正在执政的民主党，尽管拜登宣布退选，但反犹主义难以得到遏制，这一趋势有利于特朗普一方。第三，“令人欣喜的正常状态”。巴黎奥运会的良好气氛使法国人欢欣鼓舞，当前的政治时刻更加看重快乐的氛围而非事实，这有利于标榜“快乐战士”的哈里斯-沃尔兹团队。第四，还有很多愤怒和不快乐的人。本月在英国发生的暴乱展示了民众对移民的愤怒，仍然存在的民粹情绪使特朗普具有更大优势。第五，乌克兰的8月惊喜。乌克兰占领俄罗斯库尔斯克省大片土地，这暴露了普京军队的缺陷。然而这究竟是一个小插曲，还是乌克兰的重要机遇，未来几周，从乌克兰、白宫和美国大选活动中将找到答案。这一趋势对于哈里斯和特朗普双方都存在不确定性。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8/20/global-trends-2024-election-00174649>

编译：杨奕萌

9、CSIS：美国国防经济逐渐孤立

8月2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与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C·艾伦（Gregory C. Allen）和华盛顿特区办事处航空航天和国防业

务合伙人道格·贝伦森 (Doug Berenson) 共同撰写的文章《为何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如此孤立于美国经济外?》。文章认为, 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竞争力正在下降, 主要原因是防务承包商的数量大幅减少, 市场逐渐被拥有垄断或接近垄断地位的公司控制。此外, 国防工业与市场经济的隔离限制防务相关技术的资本投资。文章探讨了国防市场的高监管负担和较低的利润率, 这些因素使得许多商业公司对进入防务市场持谨慎态度。同时, 文章认为, 尽管国防公司主要专注于降低投资风险而不是创新, 但国防市场因其稳定性和低风险性对投资者仍具有吸引力。最后, 文章提到美国国防部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 旨在吸引初创企业和商业技术公司进入国防市场。然而, 国防部在推动创新与保护纳税人之间存在冲突, 这使得吸引商业公司的举措面临挑。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y-us-defense-industrial-base-so-isolated-us-economy>

编译: 孙至善

10、《政客》网站: 普京再次陷入危机

8月19日, 美国《政客》网站刊登评论编辑杰米·德特默 (Jamie Dettmer) 撰写的文章《普京再次陷入危机》。文章提出, 就在乌克兰等待对库尔斯克号入侵行动的回应之时, 俄罗斯领导人再一次证明自己正面临逆境问题。乌克兰军方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后, 俄军方并未开展更大、更猛烈

的反击，令乌军方官员感到困惑。外界纷纷猜测俄罗斯反攻迟缓的原因。其一，认为这是俄罗斯军事无能的表现；其二，认为普京的军队指挥官在慢慢集结必要兵力，以避免从顿涅茨克前线抽调过多部队；其三，认为普京决定集中面对更大问题，如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甚至使用战术核弹进行威慑和惩罚；其四，认为普京任命的负责人阿列克谢·杜明（Aleksei Dyumin）在拖延时间制定计划；其五，认为普京再次展示了他如何在危机中陷入瘫痪，甚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如新冠疫情期间，普京躲在莫斯科郊区的新奥加廖沃庄园基本没有露面。当前，乌克兰领导人和指挥官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坚守现有俄罗斯境内突出部；二是完全撤退；三是部分撤退并建立一个狭小的缓冲区。在所有不确定性中，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保留一个缓冲区，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明缓冲区是整个突出部还是一小块领土。泽连斯基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库尔斯克遭到严重挫败，或者看到一场胜利由于自大而变成一场失败，从而损害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国最终因入侵而获得的士气提升。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utins-adversity-problem/>

编译：宋琳琳

11、《金融时报》：波兰对新机场的重大投资

8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专栏文章《波兰对新机场的重大投资》。文章认为，中央通信港（CPK）新机场

被视为波兰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重大事件，旨在通过先进的物流平台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联系，并将周边农业区域转变为新商业中心。该机场虽不是专为军事目的而建，但可以为波兰武装部队提供额外地点，以增强国防能力，尤其在应对俄罗斯潜在威胁情况下。此外，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领导的政府对前任政府的 CPK 计划由反对转变为支持，政府在对该计划全面审计后决定继续推进，但对规模和预算进行调整，以确保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与此同时，CPK 计划也面临挑战，政府在是否保留前任政府选定的外国财团方面犹豫不决，这涉及与外国合作伙伴合作还是独立行动的选择，并且波兰在铁路和机场建设方面的历史表现好坏不一，曾存在信号和轨道基础设施升级缓慢的问题。最后，CPK 的成功将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克服政治分歧，在未来的选举中保持政策连贯性，以及国有航空公司波兰航空是否有能力利用 CPK 成长为国际竞争者仍然存疑，特别是在新机场启用时可能面临的竞争环境。总之，虽然 CPK 对于波兰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意义，但其实现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航空公司竞争力等方面的问题，政府必须妥善管理这些挑战，确保项目成功实施。

<https://www.ft.com/content/a219f7a1-515a-4bee-abad-29d6bdc3a922>

编译：盛邵萱子

12、《报业辛迪加》：欧洲需要新经济愿景

8月21日，美国《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撰写的文章《欧洲需要新的经济愿景》。文章认为，欧洲面临长期经济挑战，亟需新的经济愿景以推动创新和结构性转型。近年来，欧洲面临一系列经济挑战，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和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使其经济增长和安全承受巨大压力。虽然短期内欧盟央行的努力缓解了与疫情相关的通胀问题，但长期问题依然严峻。安全风险的增加和对美国防务承诺的质疑，迫使欧盟提高国防开支。同时，欧洲的生产率增长缓慢，无法与美国匹敌，阻碍了长期经济增长。此外，欧盟在技术创新领域的落后导致其生产率滞后，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不足、研究资金分散及单一市场整合不完善。欧盟缺乏支撑创新的基础设施和风险资本，但仍具备一些优势，如大量人才和社会保障体系。要应对这些挑战，欧盟必须设计出一个明确的新经济愿景，推动数字化和结构性转型。然而，这种愿景尚未成为欧盟或其成员国的优先事项。要实现未来十年的创新、经济、安全和韧性目标，欧洲需要明确方向，并采取果断行动。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needs-clear-vision-for-productivity-innovation-defense-economic-growth-by-michael-spence-2024-08>

编译：叶如静

13、传统基金会：西方国家对非援助模式应尽快调整

8月20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登其撒切尔自由中心高级研究员马克斯·普里莫拉克（Max Primorac）在克罗地亚“海峡与安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稿。该发言表示，仅美国政府一年就向非洲提供130亿美元援助且大部分为无偿性质，其他西方国家也在援助非洲上花费数十亿美元。然而非洲大陆依旧贫困、饥饿、动荡。因此，援助不是帮助非洲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佳策略，西方国家必须改变对非援助模式。发言主要观点有四：第一，西方国家对于减排的执着成为非洲国家减贫事业的重大政策障碍。一方面，阻碍新油气项目的有关政策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非洲农民无法负担起氮肥，从而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另一方面，出于减排考量，非洲国家被禁止开发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剥夺了创造收入以资助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第二，当前援助资金的实际运作者收费高昂但效率低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言建议使用更具成本效益、基于信仰的组织，他们愿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教育、卫生等关键性的社会保障服务。第三，必须尊重非洲本土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禁止将西方文明强加于他们。第四，援助非洲并不是西方国家必须做的事情，非洲各国也应努力增强财政自主，减少对援助的依赖。最后，西方国家必须改变对非援助的既有模式，从援助转向贸易与投资，从而为非洲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真正帮助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

<https://www.heritage.org/global-politics/report/africa-focus-shifting-the-paradigm-together>

编译：王昕怡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杨奕萌、孙至善、宋琳琳、盛邵萱子、叶如静、王昕怡、刘嘉滨、赵英慧、曾星月、陈芳芳、陆逸沛、高隆绪

审核：张丁、郑乐锋、贺刚、申青青